



南通縣文史資料

慶祝南通縣解放四十周年

第四輯



南 通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W165/19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南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9年五月

主 编 庄 兑 沈友白 编 校 马 烈 徐汉清

封面题字 吴沐初 封面剪纸 王子淦 封面篆刻 宋向渔



南通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内 部 发 行
成本费每册 1.90 元
印数 1—4000
南通县印刷总厂印刷

目 录

• 解放前后 •

- 解放战争初期的余西区委 杨 明 (1)
在蒋军司令部近侧建立侦察哨 蔡麟卿 (5)
解放战争初期的南通中学分校 林苇一 (19)
智歼金西还乡队 肖 星 (23)
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 丁国瑞 (26)
坚持在金汇区东部地区 姜 杰 (29)
陈家油榨伏击战 吴松涛 吴松宝口述 徐振国整理 (33)
在东警文工团的日子里 易 彬 (37)
三克通东重镇——三余 朱云谦 (40)
解放石港 戴 礼 (46)
金沙解放了 (50)
进驻二甲镇 蔡其生 (51)
解放南通城 (54)
平潮镇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 金佩珉 (56)
接管城市 斩灭潜敌 张 复 (60)
随军南下 徐庠德 (66)

• 建设史话 •

- 乡镇办厂 大有可为
——忆石港化工厂的演变和发展 严际中 (69)
陈家小圩埭的大变化 倪礼忠 (75)
令人难忘的工农联欢盛况 戴 礼 (78)

三余区水利设施发展简史	杨熙敬	(81)
南通县对中、小学师资的培训	王嘉章	(85)
二甲初中迁校记	朱章民	(93)
南通县职业中学在前进	郭 峰	(95)
南通县聋哑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戴 伟	(103)
碧霞古宫今何在 喜见琼楼接云霄		
——记金沙北山的变迁	陆牟机	(110)
•两岸情•		
永不消逝的乡情	曹 全	(116)
读家兄沈佩舒自美寄来怀乡诗	沈荣俊	(119)
一位台胞写对联的故事	瞿锡高	(121)
•人物春秋•		
忆老县长邹强同志二三事	陈伯书	(123)
怀念洪山同志	盛学熙 茅慎之	(130)
李晏复烈士传略	朱章民	(142)
缅怀吴子桢烈士	吴子英 吴周翔	(145)
忆四烈士	费春耕	(150)
学生↔老师		
——怀念李扬、许彧二烈士	陆文蔚	(154)
吴毓麟烈士传略	茅慎之整理	(157)
朱姚老妈妈二三事	王士明	(159)
纪念先师薛穆清诞辰一百周年	丁宪周 朱兆机	(163)
•读者·作者·编者•		
鼓励、说明、意见		(168)
南通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增补人员名单		(170)
各片新增加文史资料撰稿员文史书刊发行员名单		(170)
照片	封二 封三	

解放战争初期的余西区委

杨 明

一、解放战争初期的余西区委成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举行了国共谈判，在重庆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双十协定”）。为了执行这一协定，新四军从江南八个解放区撤到了江北。

我也随军从江南到了江北。大约在1945年底或1946年初，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南通县余西区，担任了中共余西区委书记。当时，余西区委驻在二甲镇北边的五福桥附近，二甲镇上还没有敌军。

我到任前，区委书记是陈德琪。我到职后，陈任副书记。区长是姜杰，副区长是陈文质。区队长是陈立平，区队指导员是曹永安（据姜杰同志回忆，他是区长兼区队长，曹永安同志是区队副）。我到余西区后，区委进行了充实，当时的区委委员有：周吉士、陈伯泉、庞宁、周兰芳（负责工会工作）、周兰芬（负责农会工作）、卞汉标，后增加了曹国宾、徐志明。候补区委有：陈献文、肖锦章、唐素珍（区妇委会主任）。隔了几个月，姜杰调走，由曹永安任区长，徐志明、陈文质任副区长，陆萍任区队指导员。

区里的其他人员有：财粮股长蔡志成，会计蔡树基，税收由施志坚负责，银行由顾盼负责。妇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严萍（妇女干事）负责。还有一个公安股长在情况紧张时跑掉了。

区委会的驻地在形势紧张后，由五福桥移至东社的陈又奇家里，后又搬迁到东社西北边三甲的曹家园上。

二、余西区委领导下的反顽斗争

1946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五四”土改的指示精神，余西区开展了土改工作。正在这时，姜桂贞、严萍等三人（还有个男同志，名字记不清了）突然遭到杀害。那天晚上，他们住在袁灶乡的一个人家，半夜里被敌人从屋子里拖出来用铡刀铡死在一条叉路上。当时袁灶周围没有敌人，连金沙都没有敌人。这三个同志的被害，引起了我们的警惕。为了搞清楚这一事件，区委曾抓了几个汉奸和怀疑对象进行审查，当时没有查出结果。1947年9月，在必觉镇战斗中才查清：据抓获的俘虏供称，是坏人到海门县茅镇向陈仲章部告密，陈仲章驻海门的部下连夜奔袭袁灶，将姜、严等三人杀害（陈仲章在解放初已被镇压）。

当然，在敌人全面“推进”前，武装特务和土匪的罪恶活动不止一次。如1946年春节前夕，武装特务陆××（绰号五路神）、许××趁我区队集中去保卫金沙之际，拂晓混入我区委驻地，企图暗杀我，被我的警卫员李毓华同志在房门口当场擒获，缴下短枪两支，使我幸免于难。

在反顽斗争中，余西区坚持原地斗争算是比较出色的。1946年底，特别是1947年初，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敌强我弱，余西区的处境十分不利。当时，东北边的三余区，西北边的金沙区、十总区紧张得连我方政权和民兵都难以存身，几乎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因而余西区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反动派还强迫这些邻区的老百姓参加“自卫队”。特别是三余区的“自卫队”，一发现我方武装和民兵，就要敲锣点火把，喊“捉土匪”，使我方人员无法

进去，我们的回旋余地就更小了。在此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余西区委仍能率领区队、民兵和群众坚持原地斗争，主要经验有三条：①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全区乡村党支部大部分比较健全，大家决心坚持武装斗争，不怕烧房子，不怕杀头，斗争意志坚决。②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真正做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对地、富也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这就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没有造成大批地、富家属逃亡，从而限制了还乡团武装的大量发展。③及时做好敌军家属的思想工作。一个敌军家属被接进了据点，区乡干部立即开展工作，使敌军家属敢于回来，留在据点与我为敌的不多，敌军也就不敢死心塌地了。这就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和坚持原地斗争。

由于余西区的反顽斗争搞得比较出色，坚持了原地斗争，受到华中九地委和县委的表扬。当时领导上布置我写了一篇题为《余西区是怎样限制土顽发展，坚持原地斗争的》经验介绍，发表在九地委的党内刊物《工作者》上。（这本小册子我一直保存着，在十年动乱中被当作“罪证”给查抄去了。）

在这同时，余西区委也受到“左”倾错误的冲击。

正当我们的对敌斗争取得一定成绩，全县局势稍稍稳定的时候，党内“左”倾错误却影响到南通县，余西区委首当其冲。当时从“上级”派来一位代表，他否定余西区坚持对敌斗争的经验，说余西区委执行土改政策搞错了，还指令解散余西区委，停止全区党员的党籍。当时我已离开余西区，调到分区部队了。陈德琪、曹永安等同志仍在那，他们都遭到打击。党员们号啕痛哭。这一“左”倾错误使余西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一定的损失，幸亏没过多久就得到了纠

正。几个月后，九地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认为余西区坚持对敌斗争是有成绩的，土改政策是执行得好的，肯定了余西区委的工作，并恢复了全区党员的党籍。这在九地委的党内刊物《工作者》“土地会议专刊”上有所记载。

三、余西区扑灭瘟疫的情况

1946年夏天，余西区霍乱流行，死了不少人。据当地人说，一条南北夹路（算为一甲）共长九里十三步，每条夹路两旁总要死去几十个人。当时瘟疫传染极快，常见到一个人今天去帮别人料理丧事，明天就自己死去。全家死亡者也不少。有几个干部也死在这场灾难里。如忠义乡乡长，他的岳父死了，区委劝阻他不要去奔丧，他不听，就要求他不要办斋饭，不要接触死者，不要因为悲痛而忘记采取防疫措施。结果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行事，回来后第二天就死了。

当时敌人的封锁很严密，群众缺医少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情况，余西区委决定由我和曹永安同志立即组织一支工作队，前去扑灭瘟疫，同行的有周吉信、唐锡鸾、曹瑞芬等，共20多人。我们深入到瘟疫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一面做好预防工作，教育群众不到疫区去，不与病人接触，不吃生东西，以减少疾病的产生和防止疫病的流行；一面直接帮助群众治病。工作队成员都学会了打针，没药就用土办法，用民间秘方治，用冷盐开水灌，以防止脱水。就这样，救活了不少群众。由于工作队的同志都学了点卫生知识，加上管理严格，一个也没有传染上疾病。经过20多天的努力，终于将这场瘟疫扑灭了。这也是我们能坚持原地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

（王士明根据杨明同志口述整理，并经杨明同志审阅修改）

在蒋军司令部近侧建立侦察哨

蔡 麟 帅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华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45年秋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设民主新中国的愿望，一再撕毁“协定”，悍然发动了空前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实现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被迫以自卫战争粉碎蒋军的进攻，经过三年多奋战，便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文所叙述的是华中军区第九分区司令部在向解放区进攻的蒋军第一绥靖司令部近侧建立侦察哨的一些片断。承当时执行此项任务的华中九分区司令部第二科内勤参谋耿杰同志提供资料，并承当时分区司令部参谋长施亚夫同志审核此稿，特表示感谢！

（一）

1945年冬，蒋介石虽撕毁了“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但当时他的大批军队尚未运到内战前线。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坚决斗争，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协议。1946年1

月10日，蒋介石也发布了停战令。实际上他还是不愿遵守，仍继续派遣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时，由美国大力装备他的军队，并帮助运送到内战前线。到1946年6月底，蒋介石认为已有充分准备，可以在3个月至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乃以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负责进攻苏中解放区的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司令官汤恩伯指挥的约15个师（整编旅）10余万人（第一绥靖司令部原设苏南常州，后迁苏北南通）。不久，国民党改委黄埔嫡系李默庵为司令官，刘嘉树为副司令，李骥麒为政治部主任，继续挥师北犯。中共方面，粟裕、谭震林将军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制订的作战方针，以运动战为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自7月13日至8月底在泰兴、海安、邵伯和如皋的皋南、丁堰、林梓、李堡等地连续作战，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果。随后主力北撤，由地方武装配合党、政、军、民坚持原地斗争，使蒋军增兵反扑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的企图落空。

1946年秋，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苏中四分区划为华中第九军分区（编者按：1945年11月，苏中四分区和三分区合并，划为华中一分区，至1946年8月，从华中一分区划出南通、如东、海门和启东为华中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副政委周一峰、参谋长施亚夫等率部配合地方党、政组织与敌周旋。九分区直属部队的组建，是以高邮、宝应调来的一个建制营为基础，逐步扩建起来的。

因为解放军主力已作战略北撤，敌我力量悬殊。为了坚持对敌斗争并取得胜利，迫切需要了解敌人动向，特别是南

通方面敌人的动向。而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和“国防部二厅”（绥靖司令部二处和各军、师、旅的参谋二处、科属其垂直领导）等特务的疯狂破坏活动，使原在南通城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除了林克同志负责的地下组织仍有点情报提供外，几乎别无所有。这给指挥作战和领导斗争带来了困难，甚至蒙受损失。例如同年秋围歼西亭之敌一役，经过一夜围攻，已摧毁守敌外围碉堡，迫使残敌退入核心碉堡，成为瓮中之鳖。不料翌日凌晨，太平桥方向右翼背后，突然枪声大作，其实不过是蒋帮南通县保卫团第三营羌永健（羌九）的一部。本可分兵迂回狙击，全歼守敌，但当时不明情况，误以为系蒋军正规主力增援，便全线撤出战斗，以致功败垂成。

南通地处江淮平原，滨江临海，乃苏中地区重要门户，而指挥蒋军反共战争的第一绥靖司令部又设在这里，为战略要地。华中第九军分区领导认为必须在南通城内建立自己的秘密侦察点，及时侦察敌军动态，以便掌握敌情，指挥战斗。经过研究，决定派该部侦察科内勤参谋耿杰打入敌区，担任此职。因为耿杰系中国共产党党员，诚实可靠，老家住南通近郊的李观音堂，他祖、父辈世代经商、开设糟坊，他又有不少亲朋、同学住在南通城里，有的还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任职，很可利用做掩护，进行工作。并决定由参谋处侦察科长方克同志单线领导。

（二）

方克科长向耿杰作了传达布置。耿杰同志考虑到上述有利条件，也想到自己没有白区工作经验，而且很多人知道他在解放区工作，容易暴露身份而败事；最后想到自己身为共产党员，应当模范地执行党的指示，乃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保证完成任务；并谈了他的初步计划，大致是：鉴于当时蒋军正向解放区猖狂进攻，气焰十分嚣张，要打入敌营内部，或策反敌人，困难很大，而且需要较长时间，恐贻误时机。因此，打算第一步利用他姊夫卢秀武（曾在蒋帮江苏保安十旅工作，当时受中统指派收编羌九所部，充任该部指导员）和他的小学老师蔡麟卿（耿家老邻世交，感情很深，当时任“中统南通区室组训科长”，解放前夕接受中共指示，参与策动蒋军两个团的起义等工作，现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为掩护，在南通城内觅屋定居，然后利用各方面关系进行侦察活动。当即报经司令部领导批准。方克科长又与耿杰研究，约定了密写方法，派徐锡林为通讯员随耿工作，指定司令部联络员张继祝与耿联系，负责收转情报和文件。同时根据斗争形势，建立几个联络点，即：1. 金沙北十总店耿昌记槽坊（即耿杰家）；2. 二窎童家店××家；3. 北坎八管黄勇（军属）家；4. 如东海滨长沙吴迪（军属）家。

1946年底，耿杰奉命出发。在如东县的大豫镇，耿杰化装成商入小老板，徐锡林化装成棉花小贩，还找了一个可靠的民兵作为车夫，用独轮车装上两捆皮棉随行。行前首长们谆谆嘱咐他，要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坚定沉着，做好工作；对蔡、卢等关系要妥为运用，争取胜利完成任务。方科长又发了活动经费（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币”）及“特别通行证”和空白公文（司令员梁灵光签署，盖有公章，以备在解放区顺利通行，必要时还可请当地组织予以协助）。然后耿杰与方科长握手言别。联络员张继祝一直送他们到双墩北面的花家园，约定10天后到联络点取耿的信（汇报进入南通的情况），而后回司令部。

由于解放军主力已作战略转移，许多乡镇，特别是交通

线上的大小集镇，大都为蒋军占据。他们经常出动窜扰。所以耿杰等化装抄小路而行，已听到枪声阵阵，耿、徐也格外小心。当晚到了十总店耿杰家，为防意外袭击，便住在邻人顾二家里。次日凌晨，仍绕道经爱儿庙到严家灶。这一带是双方拉锯地区，耿等既要防敌人袭击，又要防自己方面民兵的误会。行到十八总岸头，便机警地把“特别通行证”销毁。徐锡林也装着背车的一同前进。不久到达金沙镇北洋桥，镇上当时驻有蒋军的师部，还有南通县的国民党党、政、特务派出机构，戒备森严。耿到哨口，首先观察敌人和来往行人的动静，只见有些商贩向哨兵送些钱物，便顺利通过。耿一面观察，一面想如法通过哨口时，发现家乡邻居朱汉高，他是老贩棉花的。耿热情地向他打了招呼。朱问耿杰：“到哪儿去？”耿说：“新四军已北撤，自己想回家做生意。”朱信以为真。过哨手续便由朱办理，并搭上了军用汽车去南通。沿途很顺利，当晚便到达城里。耿杰带徐锡林到他姊夫卢秀武家（住南通城中大圣桥附近），他姊姊耿如珠热情接待，卢秀武也很热情，但略现忧容。晚饭后卢对耿说：“我们去看看蔡先生（指蔡麟卿）好吗？”耿估计是卢秀武怕他从解放区来，惹出麻烦，担当不起，带去找蔡，既可减轻自己的责任，又可对耿杰有所保护，于是一同前往。蔡如往常一样亲切接待，问耿怎么回来的？耿答：“……在苏中公学读书，因战争辍学回来的。”卢秀武说：“他住在城里，怕人误解，要请你照应。”蔡随即答应了，还问了一些在解放区工作的几位老友近况，也是一般应酬话，并无“侦查”、“盘问”之意。

当日，正是1946年底，阳历除夕，南通城里举行提灯游行，大概又是为蒋帮“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吧！耿杰心

中另有所感，正为自己能顺利进入敌人的心脏地区（南通）而高兴。他远眺长街，灯火辉煌，好似在为他预祝胜利。他仰望夜空，明星闪烁，不禁心潮起伏，想起了朝夕相处的首长，想起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都在殷切地盼望从他这里获得胜利的消息。由此，他清醒地意识到一场艰苦复杂而又残酷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他；临行时首长谆谆嘱咐“要沉着坚定，勇敢机智，争取胜利……”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回响。于是，他冷静地考虑了下一步工作如何展开的问题。

从卢秀武那里，耿杰又得悉他的旧邻同学、老友葛守谦在南通做生意，住西被闸河北，离“第一绥靖司令部”（原俱乐部旧址，即现市人民政府招待所）很近，还当了西被闸的“保长”，职务虽小，却有权办理户口登记。因此，次日清晨便去找葛，说是回来想在南通城里开店，约葛合伙。葛很高兴地答应了。耿又乘机请葛租借了住房（距蒋军第一绥靖司令部直径仅150米）报了户口。

当时蒋军“第一绥靖司令部”及其警卫部队“特务营”常有官兵，如副官、事务长、勤杂兵等，来找葛“办军差”（当时蒋军基层官佐往往要驻在地的乡、镇、保长帮助向老百姓征借财物或拉夫服役，甚至带路抓人，叫做“办军差”），因而搞得很熟。耿杰有心和这些人接近，以便从侧面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没多天，就基本摸清了南通城内驻军及党政机关分布情况。于是耿杰就密写了报告，说明安全到达南通、找到住处的经过和关于南通城内蒋帮驻军等概况，由徐锡林送到联络点。

（三）

耿杰正拟开展工作，却遇上家庭的阻力。原来他叔父耿金城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商人，在李观音堂主持“耿昌记”

老店。因见耿杰回来，住在城里，怕惹出是非，故要耿杰办“自首”（当时蒋帮沿袭1930年反共老谱，宣布了“自首自新办法”，妄图对革命人士威逼利诱，劝叛诱降，破坏革命组织），帮助他在家做生意。经劝说无效，又请蔡麟卿帮助劝说。蔡对耿杰说：“我和你父、叔情同手足，决无害你之意。你叔要你办“自首”，无非防将来万一有事，好替你讲话。”耿杰深知办“自首”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迁就，便说：“我不过在苏中公学读书，没有做别的事……”不肯办，蔡并不强耿所难，分咐道：“倘真遇麻烦，你就说是‘国民日报的通讯员’和我有关系好了。”耿氏叔侄也都满意而回。

克服了家庭阻力，耿杰准备开展工作了。他想到卢秀武是羌九部队的“指导员”，而羌部虽是地方部队（县保安团三营），却常配合“国军”出动，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搜集军事情报。于是他先与卢秀武谈话作试探。在一次闲谈中，耿对卢说：“由于国共合作，取得抗战胜利。现在又分裂，打起来了，你看将来谁胜谁负？”卢说：“共产党好是好，不过要成功，起码10年之后。”耿杰知道难以说服，决定仍以感情利用他，便向卢关于羌部情况。卢也把收编经过和编制、配备情况说了，并陪耿去找该部“连长”周汉高（羌的得力助手之一，也是耿杰的旧邻、老同学）。周对耿似有警惕，谈话不爽直。他问耿：“有没有办手续（指“自首”）？”耿说：“我已看过蔡先生了（即指看过蔡麟卿，蔡曾经手收编羌九部队）。”周说：“我们也办个‘手续’吧！”耿说：“我看蔡先生既晓得，就不必了。”卢秀武也说：“我同他去看过蔡先生，蔡是晓得的。”周汉高才放心，和耿接近了。就这样，耿从周汉高、特别是他勤务兵巫宾那里了解到县保安团等地方部队的情况及其配合“国军”出动“清剿”

的情形。

朱惠民（早年参加革命，耿的战友）的伯父是天主教徒，在唐闸天主堂做事。耿通过他也了解到许多情报，并把天主堂作为在唐闸进行侦察活动的落脚点。

国民党讨袁烈士沙淦之弟沙一余与耿家是亲戚，他对西亭、观音山一带情况很熟悉。由于他女儿沙露等都参加了革命，也向耿杰提供情报。

西安是国共“拉锯”地区，耿杰的岳父祝佑之住在那，为耿探听消息，也成了耿的耳目。

沿江各港口，是蒋军南北调动的要道。耿杰除运用当地关系了解情况外，还常常亲自到天生港、芦泾港、任港、姚港等地观察、了解，搞清沿江布防兵力，以及阵地、工事等情况。

耿杰的舅父张学文住在草庙子（金沙到南通公路边上）。此处是来往过境部队必经之地，耿也关照张加以留意，将过境部队的人数、枪支记清及时告诉他。

这些关系，看来似乎平常，有时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1946年冬（农历除夕前后），蒋军四三七团、四三八团，由四甲坝分三路向唐闸集中，有二路被耿侦察到。其中四三八团途经李观音堂休息，恰巧耿杰在家，便利用有些官兵在他家酒店休息的机会，“热心”供应茶水，还捧出一些花生“招待”、“慰劳”，乘机从几个士兵和班、排长口中探听该部的动向。该部营长××似乎警惕性较高，问耿：“你为什么这样给东西我们吃……？”耿杰机警地说：“你们国军纪律严明，效忠党国，为民解忧，这是民众对你们的谢意呀！”那个营长被捧得飘飘然，也吃起花生与耿攀谈起来了。